

罪恶的旧社会

——旧中国经济杂谈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罪恶的旧社会

——旧中国经济杂谈

第二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罪恶的旧社会
——旧中国经济杂谈
第二辑

*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 001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3/8 插页1 字数46,000

1965年3月第1版 196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5,000

统一书号:4074·366 定价:(六)0.19元

封面设计:余竹君



編者的話

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是罪恶的社会。

解放前的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象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剥削阶级不劳动，过着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劳动人民終日为剥削阶级做牛做马，却是一辈子受苦受难。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們經常受人欺侮，遭到人身的迫害，沒有呼吸的自由；他們掙扎在飢餓線上，經常遭受失业的痛苦，沒有生存的权利。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是說不完、訴不尽的。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并且已經用自己的双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新社会，劳动人民从过去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工作和生活都得到了保障。随着伟大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也不断提高。农民們說：“站在家门口，望

100/2/103

到天安门”；工人们说：“我是厂的，厂是我的”。正是由于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就能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斗志昂扬、满怀信心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为争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这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整个过渡时期中，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如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所指出的：“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有必要经常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阶级教育。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罪恶的旧社会——旧中国经济杂谈》（分辑出版），介绍旧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概念，就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来帮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认识旧社会的黑暗和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从而进一步体会到今天生活的幸福，提高阶级觉悟。有人说得好：“不忆从前苦，哪知今日甜。”这套读物中所介绍的虽然都是过去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但看看过去，比比现在，展望未来，就能激励我

們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

由于我們缺乏經驗和现有水平的限制，书中一定还存在不少缺点，甚至有錯誤的地方，希望大家提出意見和批評，幫助我們进一步提高这套讀物的质量。

1965年3月

目 录

“拿摩温”	徐克礼(1)
养成工	陈惠丽(9)
罰工錢	史景星(16)
长工	桂世杭(23)
“定租”和“活租”	董俊明(31)
“农貸”	刘守定(37)
“金圓券”	馮品人(43)
“生活指数”	傅 泗(49)
“戶口米”	张汉藩(56)
“大減价”	王有生(63)

“拿 摩 温”

徐 克 礼

上海工人文化宫在一九六三年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展出了这样一张照片：解放前纱厂女工在凶恶的“拿摩温”的监视下，艰难地劳动着。照片旁边，附有一首歌谣：

踏进工厂门，
自由被剥尽。
老板心太狠，
待我促象犯人。
黑心领班“拿摩温”，
凶暴又残忍，
做工稍不慎，
打骂重罚，
工资充公，
甚至赶出门。

“拿摩温”是什么？怎样来的？为什么对待工人那样凶暴又残忍？生长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年轻一代，不少人恐怕还不清楚，有的甚至完全感到陌生。但是，老一辈的工人，在旧社会里十之八九都曾身受其害，现在回忆起来犹有余痛。

“拿摩温”是英文“Number one”（缩写是“No.1”）的譯音，它是外国資本家对雇佣的中国工头的称呼。一八四〇年鴉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掠夺和剝削中国人民，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上海开办了許多工厂。他們在企业中制定了一套监督工人的残酷制度，豢养一批忠实的爪牙，来管束、压迫和剝削工人。“拿摩温”就是其中最通行的一种。在帝国主义分子開設的工厂中，“拿摩温”几乎在每个車間里都有，他們不干活，只負責监督工人生产。在有些工厂里，不仅有“N0.1(大工头)”，还有“N0.2(二工头)”。外国資本家利用高薪和津貼等办法收买“拿摩温”，要他們监督工人，迫使工人拚命劳动，以便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血汗。“拿摩温”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狐假虎威，就可以任意打罵、惩罚以至开除工人。所以，“拿摩温”实质上是外国資本家用以压榨中国工人的走狗。后来，中国資本家为了加强对工人的控制和榨取，也采用帝国主义在华工厂的管理制度，竞相設置“拿摩温”。于是，“拿摩温”

这种残酷地压榨工人的制度，就在中国資本家的工厂里盛行起来。

解放前，紗厂女工在“拿摩温”的監視下劳动。



“拿摩溫”的社会出身和政治背景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中有些是招工头轉成，有些是資本家的亲信，还有少数原来是工人被資本家收买提升的。“拿摩溫”一般都带有封建性，有些是在“青帮”或“紅帮”中拜过“老头子”的，有些是恶棍、流氓，还有一些則是汉奸、特务。他们之中虽然有些原来是工人，但被資本家收买成为“拿摩溫”以后，就已经不是真正的工人，而变成資本家的走狗了。总之，“拿摩溫”是帝国主义者和資本家对工人群众进行压榨、剝削的工具，同时他们自己也参与了对工人的压榨和剝削。

“拿摩溫”压榨工人的恶行，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当然是充当資本家的帮凶，千方百计为資本家效劳，迫使工人无休止地从事劳动，以供資本家尽情剝削。資本家是一批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们为了尽情榨取工人的血汗，总是想尽各种方法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迫使工人日日夜夜为他们拚命劳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专门制訂了各种苛规和禁律，并采取了一些穷凶极恶的措施。“拿摩溫”就是这些苛规和禁律的具体执行人。他们整天在車間里穿来穿去，监督工人劳动，专找工人的麻煩。他们往往假借工人违反厂规、触犯罰則为名，动辄惩办工人，罰工扣薪，直至收“折子”开除（“折子”亦称“工折”，是解放前厂方发给工人的做工凭証）。“拿摩溫”对待工人如牛馬，任意虐待工人，作恶多端。据上海国棉十二厂老工人王小妹回忆她十岁进一家繅絲厂当童工时被“拿摩溫”虐待的情景說：“做工的时候，‘拿摩溫’在車間里穿来穿去監視着我們。我們生活做得稍为慢一点，他

就拿打脚踢，任意打罵。要是我們不当心出了些差错，那就沒命了。凶恶的‘拿摩温’就会拿滚烫的开水，沒头沒脑地朝我們浇来，浇得我們脸上、手上顿时烫起一个个泡。挨了打，挨了烫，还不准回一句話，也不准哭，連看都不准对‘拿摩温’看一下；不然，‘拿摩温’又要一把抓住我們的辮子，繞在自来水龙头上，用捞蚕茧的銅鏟子，渾身上下乱打。有时，凶恶的‘拿摩温’还会抓住我們的手，用头发釵子乱戳已經燙得又紅又肿的手指。俗話說：‘十指連心’，那个痛啊，真是痛彻心肺，痛得我們只好惨叫救命。但你越是叫喊，‘拿摩温’越是戳得凶，直戳得十指鮮血淋淋，痛得暈倒了，才肯罢休。可是回过头来，还要硬逼我們繼續劳动。”

那时候，工人在“拿摩温”的淫威下，在极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工时极长，一般都要一天劳动十小时、十二小时，有的甚至高达十七、十八小时，沒有一息喘气的机会。有些厂，甚至連工人吃飯的时间也被剝夺了，大小便也受到无理的限制。如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上海英美烟厂，就不許工人在車間里吃飯，要是有人偷偷地吃点东西，被洋监工或“拿摩温”查出，輕則把食物夺下来抛在垃圾箱里，重則拿打脚踢、罰扣工資，甚至把烟草塞在食物里，强迫工人吃下去，不吃就要被开除。因此，工人們往往从早上六点钟进厂，一直要餓到晚上七、八点钟放工回家，才能吃飯。許多工人就这样得了严重的胃病。在这个厂里，还有另一种虐待童工的规定：童工大小便要領牌子。“拿摩温”常常跑到廁所里去查，要是誰沒有牌子，就要挨一頓毒打，甚至被开除。几百个人的一个車間，只有

四、五块牌子，有的童工因为領不到牌子，常常急得尿在褲襠里。有些工人被迫病了也不請假，咬紧牙关去上工，因为三天不上工，就会被“拿摩温”开除出厂。所以，有不少工人就在饥病交加、疲劳过度的煎熬下，惨死在車間里。“拿摩温”只顾資本家的利益，对工人是残酷无情的。他們看見工人因病或劳累过度而昏倒在車間里，反而大罵工人“偷懶”、“装死装活”。甚至工人被机器轧伤死亡，他們也无动于衷，还說“死有应得”。真是狼心狗肺到了极点！那时，女工最怕的是怀孕。在資本家和“拿摩温”看来，怀孕就是犯罪。女工大了肚子，一旦被“拿摩温”发觉，就会被解雇。解放前，成都裕华等紗厂的資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潤，特別規定了“五不要”：結婚的不要，怀孕的不要，有孩子的不要，生病的不要，年老的不要。因此，怀孕了的女工，就不得不狠心把肚子扎紧，见了“拿摩温”，总是設法躲着走，恐怕被他們看見。有的女工熬到临产时还去上工，孩子生在車間里和廁所里是常有的事。有的“拿摩温”竟坏到如此地步：逼着即将临产的女工到馬路上、桥底下去生孩子，而且还要立即开除出厂。解放前，在宁波和丰紗厂就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悲惨的事：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已經快半夜了，突然，夜班女工陈金花肚子疼了起来，因为劳累过度而要早产了。工头得知此事，忙将她拖出車間，硬要她回到十里路外压赛堰的家里去。陈金花没有办法，只得忍着疼痛赶回家去。結果，在半路上生了孩子，孩子当即冻死了。

“拿摩温”不仅是資本家无情榨取工人血汗的帮凶，而且还是直接剝削工人的吸血鬼。他們經常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資。

很多童工、养成工和新进厂的工人，常常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三年拿不到工钱，原因就是被“拿摩温”侵吞去了。前面谈到的上海国棉十二厂的王小妹同志，她在十四岁时到上海老怡和纱厂去学摇纱，明里讲是每月工资三元，但中间却被“拿摩温”扣去一元四角，实际上每月只得一元六角，以致她在这家厂做工三年，连双胶鞋都买不起。

不仅如此，“拿摩温”还经常借故对工人进行种种敲诈勒索。工人进厂做工，先要给他们送礼送钱，然后才答应当“介绍人”，不然，就别想进得厂门。此外，逢年过节，他们还迫使工人“孝敬”钱礼。有些“拿摩温”平时甚至借用婚事、丧事或阴寿、阳寿等名义，大打秋风，硬要缺衣少食的工人向他们“送”厚礼。那时候，工人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连饭都吃不饱，哪里有钱送礼？但是，“拿摩温”却不管工人的死活，一定要送。如果送少了，他们就借势调你去做难做的生活，或者故意找个毛病，打骂罚工钱；不送的，更倒霉，过不了几天，就会无故被开除。因此，有不少工人只好当东西、借印子钱来向他们送礼。杭州棉纺厂的一个老工人控诉说：“八月中秋，我们工人家里米汤照得见瘦脸。‘拿摩温’家里，由于工人‘送’的月饼吃不完，还在门口设个小摊做买卖。要说这种剥削有多重，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恶工头孟阿巧，用这种年节的‘礼物’作本钱，竟开起了一月棉布店！”有些“拿摩温”还利用会道门欺骗、剥削工人。如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天津裕大纱厂中的“拿摩温”赵奎高，就是个一贯道的坛主，他经常欺骗、引诱工人参加一贯道，搞迷信的甚至反动的勾当。入道时要交两块

錢，工人发了工錢就須到他家里去上供，此外，他还三天两头找工人要錢，不是买“法宝”，就是造“法船”，有不少工人都被他搜刮得沒吃沒穿，有的甚至弄得家破人亡。

“拿摩溫”的惡行不只如此，他們还仗勢要工人為他們做無償勞動，把工人当奴仆使喚。象有些紗厂、食品厂、卷烟厂的“拿摩溫”，就是这样虐待工人特别是童工的。在夏天，他們要工人給他們打扇、捏痧子；吃飯的时候，要給他們送菜端飯；下了班要給他們倒洗臉水。总之，要工人把他們伺候得好好的。有时候，下工后或星期天，还要工人到他們家里去干杂活，如洗衣服、抱孩子、洗尿布、挑水、劈柴、做飯、扫地、倒馬桶等等，什么都要干，否則，就会被找个岔子扣錢、停生意。

“拿摩溫”对工人是压迫、压迫、再压迫，对資本家主子却是奉承、奉承、再奉承。他們一方面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和資本家，充当工具和走狗，另一方面却压迫工人，在工人中制造分裂，分化工人团结，破坏罢工斗争。如在“五卅”运动中，一些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开办的企业里的“拿摩溫”，竟出卖祖国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背地里向帝国主义分子献策，威胁、利誘、强制工人复工，充当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上海英美烟厂有个姓罗的“拿摩溫”，在“五卅”大罢工时，为了討好帝国主义主子，竟命令他的爪牙胁迫工人去上工。同时，还有一些“拿摩溫”受洋大班的指使，卑鄙地暗中在浦东、浦西招募了大批的临时工，妄图采取这种手法，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此外，他們还經常依靠中外反动势力，监视、压制工人的进步活动，开黑名单，多方陷害工人。

“拿摩溫”幫同帝國主義、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工人的惡行，三天三夜也說不完。但是，壓迫愈甚，反抗愈烈。中國工人階級是有骨氣的。他們對於“拿摩溫”的殘暴行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就紛紛起來反抗和鬥爭。這些鬥爭，狠狠地打擊了“拿摩溫”的反動氣焰，也打亂了帝國主義、資本家壓榨工人的如意算盤。

“拿摩溫”既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它必然隨着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改變而消滅。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獲得了解放。套在工人身上的枷鎖之一——為工人所痛恨的“拿摩溫”制度，也在解放初期民主改革運動中被廢除了，代替它的是新型的民主管理制度。這一變革大大鼓舞了工人羣眾的政治熱情和生產積極性。人們在鮮明的新舊對比中，進一步加深了對新社會的熱愛。

养成工

陈 惠 丽

在旧中国的工厂里，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不但剥削一般雇佣工人，而且还使用了大量工资低廉的“养成工”。所谓“养成工”，就是由工厂出广告或委托招工头招收的男女童工和青工。她（他）们在入厂时，一般都要订合同，交保证金，找铺保。入厂后有一段“养成期”，在此期间内资本家只供给十分粗劣的膳宿，没有其他待遇。养成期满后，还必须在厂里服务数年（一般是三年），只拿最低工资，中途不准离厂，否则就要追回养成期内的全部费用。

养成工制度是手工工场的学徒制在大工业中的残余。这种制度最早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的工厂、主要是纺织厂开始采用的，以后，中国纱厂也跟着使用。资本家采用养成工制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从养成工身上榨取大量的剩余价值，更重要的是想在政治上借助养成工制度来压制其他工人的反抗。大家知道，解放以前，我国工人阶级是遭受着国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的，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自由和保障。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工人阶级有了明确的革命斗争目标；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人阶级

队伍的組織日益加强，工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热情也有了迅速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有組織的工人面前，资本家企图削弱工人的反抗，仅用开除个别工人的办法来威胁，已达不到阻止工人参加斗争的目的。于是，他们在采用别的手段的同时，也采用了“养成工”这一手。因为养成工入厂时，除必须交保证金外，还要保人保证她（他）们“绝对遵守厂规”、“不参加罢工”、“不煽惑鼓动他人”、“不口出怨言”等等。一句话，就是逼使她们忍受一切压迫和剥削。再则，资本家也知道，养成工年岁较轻（一般是十四岁到二十岁，个别小的只有七、八岁），缺少斗争经验，进厂后到服务期满又都住在厂里，并单独有养成工工作区，因此比较容易控制。同时，有些养成工还是包身工，她们是由包工老板从农村中包来后再进厂的（如申新九厂一九三六年招收的一千二百多名养成工，大多数是包身工），平时除了受本厂工头管束外，还要受包工老板的严厉看管，根本没有机会参加任何活动。因此，养成工就成为一批稳当可靠的剥削对象，资本家利用这批靠得住的劳动力，来抵制一般雇佣工人的反抗和斗争，加重对他们的压榨，迫使他们接受苛刻的劳动条件，领取低廉的工资。工人要是反抗，资本家就以解雇来对付。事实上，有不少资本家在使用了大批养成工后，就逐渐赶走了一批敢于同厂方作斗争、工资又较高的男女工人。这种情况，对资本家说来，当然是很如意的：既可减少工人反抗的压力，又可增加他们的剥削收入。所以，申新四厂的一个资本家曾说：“招收养成工暂时虽不免牺牲(?)一些，然而一劳永逸，将来管理如意，‘品质’优良，正